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于文杰 著

英国文明与世界历史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英国文明与世界历史

于文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明与世界历史/于文杰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60-9

I. ①英… II. ①于… III. ①思想史—研究—英国②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1195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目 录

英国文明篇

英国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与特征	3
论英国 19 世纪手工艺运动	31
英国早期手工艺运动的兴起及其国际化问题	53
按照传统的方式重新书写世界历史 ——对英国学者利文斯通《国际手工艺运动》的解读	67
英国近代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	81
英国近代自由主义观念及其发展轨迹	96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传统及其历史演变	110
英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主要流派	126
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历程及其若干问题辨证	151

世界历史篇

西方现代思想的历史根源	177
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	188
欧洲民族共和主义的历史脉络	211
休谟的共和主义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225
西方现代生态思想及其历史演变	236

西方思想史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250
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历史意义	258
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268
后记	278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藪。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棻、刘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纂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英国文明篇

英国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与特征

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总是和这一民族早期文化传统的形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列颠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帝国,正是由于域外异族征服及其对异质文明的融合、基督教文化的主动吸纳,尤其是对希腊与罗马古典文明的充分摄取,这些因素在不列颠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英国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克特说:在盎格鲁-萨克逊人到来之前,诸多部族还没有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罗马文化给了不列颠以最早的启蒙;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罗马人带来的光辉的福音,不列颠人将依然沉没于黑暗与野蛮的历史之中!^① 我们知道,在英国近代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中,来自罗马的诸多文明给不列颠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欧陆诸多文明尤其是罗马文明,是英国近代社会崛起的文明之根。据初步查考,不列颠对于古典文明的摄取留下一条坎坷复杂的历史轨迹,其间经历过许多群体、许多地域、许多宗教圣地,还有许多大学,及其取得的早期主要成就。正是通过这样一些路径,古典文明才最终来到不列颠。

(一)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展现的基本路向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序中通过不同的学术群体的更替、历史空间的位移、早期成就的形成等因素,呈现出自己的路向的。

^① John Whitaker, B.D., *The Ancient Cathedral of Cornwall*, Printed For John Stockdale, London, 1804, p.2.

1.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学术群体的更替及其主要贡献

学术群体的更替对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古典文明的文化内涵在具体的历史空间中呈现,都是凭借传播主体来实现的。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进程中先后有希腊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不列颠人等做出了贡献。

希腊人对于古典文明的贡献尤其重要。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创造了政治;他们同样创造了政治理论,而且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① 希腊人拥有相当繁荣的古典文明。他们不仅精通诸如医学、建筑、天文等学科,而且他们的论证艺术、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对复杂问题更为敏锐的理解力均有着实用价值,这一种古典文明,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一种强大的感召力。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继承经历了由主动学习到着意控制的历史变迁。这是因为,在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历史时期,罗马人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当罗马人对东部进行征服时,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垄断政治与军事权力,而文化却由希腊人垄断;另一方面,罗马人要有效地控制希腊人,就必须首先拥有希腊文化,即便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存有不同的态度。在历史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罗马人的智慧伦理超越形而上学,有效地实现了形而上学的经验化转向,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而又充满张力的古典和中世纪文明,从而成为通向近代文明的桥梁。

罗马人全方位地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独特创造力。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始于前3世纪中叶。他们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以希腊模式创作……在前2世纪早期,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的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未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人所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并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意学习修辞学时,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这也即是老加图极力呼吁从罗马驱逐希腊教师的缘故。但为时已

^① F.I.芬利:《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晚不能有任何改变;在西塞罗还是年轻人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师从于希腊教师,后出国赴雅典或罗德斯进修,已是司空见惯的事。^①

阿拉伯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出了许多工作。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阿拉伯人对古典文明传播的贡献。西方学界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古典著作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进入阿拉伯世界的。^②到9世纪中叶,是古典文明传播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学人伊本·铿迪翻译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除了《政治学》之外的主要著作,还著《第一哲学》讨论人的灵魂和知性问题,为古典时期的科学、哲学和文化的传播,做出很大的贡献。^③11世纪,由于拉丁文翻译被人们称作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西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传播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神学和形而上学,并进一步发展了铿迪的哲学思想。最引人关注的是阿维洛伊(Averroes, 1126—1198年),在许多阿拉伯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学的情况下,阿维洛伊已以评注亚里士多德全集而著称。不仅如此,他还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了评注。^④阿拉伯人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在西西里岛多元并存、相互交融,而叙利亚又是阿拉伯人传播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可见,阿拉伯思想家们为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古典文明才得以由南欧传播到西南欧直到西北欧。

犹太人对古典文明的复兴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犹太人是一个极其神奇的群落,几乎每一种近现代文明的创造都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犹太人大多与伊斯兰人交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的语言也可相互交流、相互使用。从12世纪起,有相当一部分古典著作由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好像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使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选录(doxographies),但他们很快得到有阿拉伯语注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语是伊斯兰土地上犹太人说话和写作时用的语言(有时候用希伯来语字母)。^⑤伊斯拉里(Isaac Israli, 850—932年)、加比罗尔(Solomon ben Judah ibn Gabirol, 1022—1054或1058年)、犹太·哈列维(Judah Halevi, 1075—1140年)、迈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ides,

① F.I.芬利:《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② Pet Adamson, Richard C. Taylor, *Arabic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5, p.10.

③ 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3页。

④ Pet Adamson, Richard C. Taylor, *Arabic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5, p.281.

⑤ 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1135 或 1138—1204 年)等思想家,他们是犹太人中传播古典文明的代表。灵魂学说、知识论、世界初始元素理论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介绍和评论。加比罗尔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灵魂学说和知识论,加比罗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与普罗提诺也有相似之处,^①而迈蒙尼德则认为,12 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主义展示出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犹太哲学的主导性影响。^② 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极致,亚里士多德著作是讨论科学的所有著作的根本和基础。学界认为,在犹太思想家中,没有人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方面贡献更为杰出的思想家。^③ 他们还认为,如果难以理解古典著作,可以通过阅读阿拉伯思想家拉法比和阿威洛伊翻译的著作。可见,犹太思想家对于古典文明的传播是与阿拉伯思想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相互交融,共同生长。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是将古典著作从西西里岛、阿拉伯世界经地中海传播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忠实使者。在法拉比和阿维洛伊时代还不能完整地向西欧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比如他们可能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熟悉,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比较陌生,甚至在西班牙根本就难以看到这本书。^④ 然而,他们依然是古典政治学传播的杰出代表。

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对于古典著作乃至古典文明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伦三岛的学者,尤其是苏格兰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除了爱留根纳(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族群,只是在不同时域称谓不同)、约翰·斯各脱、威廉的奥卡姆之外,米切尔也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仅就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大约从 1120 年开始,苏格兰的米切尔先后翻译了《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回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等著作及其不同版本。^⑤ 米切尔对于古典著作传播的贡献,在英国乃至西欧形成了重要影响。

2.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之空间位移及其历史轨迹

与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相比,原有的古典文明的存在形态随着空间位移而

① Daniel H., Frank and Oliver Leaman,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3, p.94.

② Daniel H., Frank and Oliver Leaman,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3, p.142.

③ Daniel H., Frank and Oliver Leaman,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2003, p.157.

④ 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 页。

⑤ N. Kretzman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82, pp.75 - 77.

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古典文明存在样式的扬弃与重建。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程中,空间位移伴随着诸多思想家对古典文明的思考与重构而创造出新的学术样式,重新显示出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知道,从古典文明生存空间的位移来考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论是传播的机构群体还是路线,均需仔细查考、辨别和论证:一方面,古典文明,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从希腊罗马,即现在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经过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传播到伊比利亚,即西班牙半岛,然后传播到西北欧;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群体、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机构在古典文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均担当过重要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经过许多环节、许多途径,并且诞生了许多思想家和社会群体,它是在多元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古典文明西传不列颠的文化内涵是与空间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先后经历了不同的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形态与文化内涵。比较早的是伴随着宗教文明传入的法学、修辞学,其次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最后是政治学和艺术学。

据查考,首先被翻译到不列颠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逻辑学著作。它们是《范畴篇》、《分析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正位篇》、《辩谬篇》。时间大约为 510 年至 1269 年之间,译者主要是古罗马的波爱修、法国的莫尔伯克的威廉和威尼斯的詹姆斯等。其次是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论天》、《论生灭》和《气象学》。时间大约在 1125 年至 1270 年之间。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克雷莫纳的杰拉德、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罗斯泰斯特等。再次是心理学和生命科学,包括《论灵魂》、《论感觉》、《论记忆》、《论梦》、《论发明》、《论长短》、《论气息》、《论朽灭》、《动物志》。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最后是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诗学。译者主要有威尼斯的詹姆斯、苏格兰的米切尔、莫尔伯克的威廉、牛津的格罗斯泰斯特和海曼·阿莱曼等翻译家。^①事实上,宗教因素应当是决定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先后序列的基本原因。

古典文明中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均具有丰富的知识

^① Norman Kretzman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82, pp. 74 - 78.

与思想,并得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在英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我们知道,形而上学给民族以科学思维,伦理学给社会以道德规范,政治学给国家以权力秩序,艺术学给人类以生命活力。然而,由于教俗权力始终存在矛盾及相关因素,相比于《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以及《诗学》等文化经典,《政治学》的译介来之晚矣。此处正是以《政治学》为个案进行考证:

在政治学与政治理论史方面,12世纪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因为涉及国家与教会的传单文学在授职权之争中刚刚耗尽了力量,而更系统的研究要等到126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面世才重新出现。在这样一个中间的时代,最突出的成果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59年编写的《政治学指南》(*Policraticus*)或《统治者之书》(*Rulers' Book*)。^①这一判断,完全符合于历史事实,因为直到1264年左右,完整的《政治学》才被法国学者莫尔贝克的威廉翻译后才介绍到英国并发挥影响。^②然而,是谁架起了这一座桥梁呢?有人认为,古典文明传播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来自诺曼人统治的多民族文化交汇的西西里岛;另一条来自以阿拉伯人为主要传播者的西班牙。^③可实际上,古典文明主要由希腊经阿拉伯世界到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传播到西欧,在总体上大致呈现出这样的空间结构与历史轨迹:

亚里士多德(希腊)→克雷莫纳的杰勒德(阿拉伯)→多米尼克斯(西班牙)→沃特·伯利(英国)→莫尔伯克的威廉(法国)→罗吉尔·培根(英国)→乔治·拉尔森(英国)→约翰·洛克(英国)。^④

由此可见,从希腊罗马、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到西北欧,构成了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基本线索和历史脉络。当然,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对古典文明的传播也从来没有停止,教堂等宗教圣地也是古典文明累积和传播的重要领地。

在英国,分权学说影响最大的是洛克。他在《政府论》中说:国家政治的权力可以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⑤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孟德斯鸠的学说,

① C.H.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② E. Stump,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82, p.78.

③ 赵敦华:《基督教文明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④ 于文杰:《古典〈政治学〉西传英国历史源流考略》,《英国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⑤ 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

同时也是对 17 世纪英国整个时代分权思想的总结。然而,洛克却不是 17 世纪三权分立学说最早的提出者,在此之前,查尔斯·达利森和乔治·拉尔森都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是他们为洛克三权分立学说的全面建立奠定了基础。查尔斯·达利森在《为保王党人辩护》中曾经这样说,国家要有三种权力:政府的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利和审判的权力。^①

乔治·拉尔森是前洛克时期分权思想最为完善的思想家。在《霍布斯的〈利维坦〉政治部分考察》中,拉尔森说: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②对此,拉尔森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他说,立法权对于国家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不可分割地属于已经确立的君主。君主以此来引导他的人民遵守法律,君主必须遵守法律并以此来治国。立法权同时包括撤销、重新阐释和修订法律,同时包括荣誉的授予、保留、终止和恢复的权力,兴办大学和建立团体的权力;执行权主要包括官员的设置与官员的权力;司法权力指的是司法制度的建立与管理,管理世俗、宗教和军事事务,以及根据惯例,通过讨论与裁决等方式对过失与成绩进行司法裁判,对罪行是否是死刑进行免除、终止和宽恕,执行司法程序与法院管理的权力。^③乔治·拉尔森等人的分权思想,不仅表明洛克不是近代英国最早重建分权学说的人,^④更说明近代英国的分权思想源远流长。我们认为,乔治·拉尔森等人的相关论述,为洛克三权分立学说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更重要的是,洛克与拉尔森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 1683—1688 年流放荷兰期间,洛克于 1687—1689 年之间经常光顾他的一位商人朋友本杰明·弗利的私人图书馆,并读到拉尔森 1657 年出版的著作《对霍布斯〈利维坦〉政治部分的考察》。1688 年,在洛克准备回英格兰的时候,他的秘书在洛克的藏书中也看到了拉尔森另一本重要的初版著作《神权政治与市民政治》。^⑤毫无疑问,拉尔森的著作给洛克分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罗吉尔·培根或许是希腊政治学说的另一位重要的传播者。他曾经说过,拉

^① Dallison Charles, *The Royalists Defence*, London, 1648, p.2.

^② George Laws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 of Mr. Hobbs His Leviathan*, London, 1657, p.8.

^③ George Lawson, *Politica Sacra et Civilis*, London, 1660, pp.40 - 41.

^④ 陈晓律主编:《英国研究》第 2 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2 页。

^⑤ A.H. Maclean, "George Lawson and John Lock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9, No.1, 1947, pp.69 - 77.